孙犁的写与读

□冉淮舟

无论是广大的普通读者，还是众多的专业作家，都非常喜爱孙犁的作品。其原因在我看来，主要有这样两点：一是审美欣赏价值；二是写作示范意义。

1963年，《中国文学》法文版和英文版要译载孙犁的《山地回忆》等短篇小说，同时刊发关于孙犁的专访。这时，吕剑到了天津，我陪他去见孙犁。我记得好像并没有谈多长时间，但吕剑回到北京后，很快便寄来一篇近5000字的《孙犁会见记》中文打字底稿。孙犁看后，大加赞赏，说这就叫“识力”。我还从未听见过他对于有关自己作品的评论文章，予以这样高度的评价。这篇打字底稿，一直由我保存。“文革”后，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小说集《村歌》，孙犁把这篇文章作为附录，收入书中。每有各地来访，谈到他的创作风格等问题，他都是推荐吕剑的文章。也因此，辽宁师院曾打印50份，分赠各文科院校。

吕剑的《孙犁会见记》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个方面：一、孙犁的小说，怎么总是写得那么短，那么单纯，那么明净；二、孙犁写女人，怎么这样传神？孙犁回答：一是写小节，二是写柔情。他的这一文学主张，早在1941年，便写入了《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》一书，即不断再版，还曾叫过《怎样写作》《文学入门》的《文艺学习》；并把这种方法，始终运用在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。在《文艺学习》一书中，孙犁写道：“作者不断地练习，使他能看出一个事物的最重要的部分，最特殊的部分，和整个故事内容故事发展最有关的部分。作者强调这些部分，突出它，反复提示它，用重笔调写它，于是使这些部分，从那个事物上鲜明起来，凸现出来，发亮射光，照人眼目。”这样，虽然写的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环节，读者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鲜亮的环节，抓住整条环链，看到全面的生活，整个的人物。至于柔情，一般来说，妇女的性格和心思，都是通过很微细的动作、很含蓄的话语表露出来，这对作者来说，或是容易忽视，或是因为司空见惯，习以为常，而不予注意。但是孙犁则认为，一定要敏感到这些，捕捉住这些，并且格外予以重视；再加上联想，这个很微细的东西，必然又会得到进一步的升发。这样一来，写小节柔情，就能达到质朴、单纯和完整的统一。这是孙犁最为重要的写作方法，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神之笔。他甚至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：“写文章最怕添油加醋，也怕只讲道理。主要是写人物的言与行。而且最好是多写些无关重要的小事，从中表现出这个人物的为人做事的个性来。”这里所讲无关重要的小事，实际上说的也是那些小节柔情。孙犁还进一步对这位友人说：“你写那种文章（指印象记），最好把你见到的我性格上的缺点也写进去，这样你的文章就有了不同一般的性质。不要单纯歌颂，那样是站不住脚的。这是我对你最有用的建议。”这是引人深思的真知灼见，也是孙犁的独特之处，与众不同之处。

孙犁的理论和他的创作，是相互结合、相互印证、相互辉映的。他最喜爱自己写的抗日小说，在回答吴泰昌问“你最喜爱自己的哪几篇作品”时，他是这样讲的：“现在想来，我最喜欢一篇题名《光荣》的小说。在这篇作品中，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。对于我，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，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。”这篇小说有一万字，是孙犁写的篇幅较长的一个短篇。写一个叫秀梅的女孩，鼓励村里一个叫原生的青年参军抗日，她自己也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工作。后来原生的媳妇小五离开了原生家，秀梅则一直等着原生的胜利归来。孙犁极富诗意地把农村的日常家庭生活，那些小节柔情，和伟大的抗日斗争、社会生活相联系，让新时代的光辉，在年轻恋人们的身上投下了有力的影响，使他们的生活和理想发出了耀眼的光芒，从而也就使作品富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
孙犁对我说过，他最喜欢的是《山地回忆》。这篇小说，写一个叫妞儿的女孩子，心疼在寒冷里没穿袜子的抗日工作人员，给他做了一双新袜子。看来这显然是生活琐事，但在孙犁抒情的笔墨下，写得非常亲切，洋溢着、激荡着感人的、亲如骨肉的平凡、朴实的劳动人民的人情美和人性美。在这里，孙犁正是通过这样的小节柔情，把人类最美好的情感，即人道主义的情怀，升华到了一种极致。

孙犁还对我说过，他的结构最完整的小说是《“藏”》。这个短篇，写新卯和浅花这对年轻、幸福的夫妻之间产生的矛盾，浅花对新卯有了疑心，两个人的关系一度很紧张。结果是新卯为了抗日工作，在村外菜园子里秘密挖地道。当敌人来扫荡时，这个地道不仅掩护了抗日干部，浅花也在地道里生下一个女孩子，起名叫“藏”。

孙犁写得精彩的短篇小说，还有被人称为“天籁之声”的《琴和箫》，这一篇似乎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；还有与《琴和箫》几乎同时写出的《丈夫》，写一个年轻媳妇，在中秋节思念参军抗日的丈夫，结果收到丈夫托人捎来的信，快活了一晚上，竟连那圆圆的月亮也忘了看；还有家喻户晓的《荷花淀》，以及《芦花荡》《碑》《钟》《嘱咐》《纪念》《浇园》《蒿儿梁》《采蒲台》《吴召儿》《小胜儿》《正月》等。当然，还有中篇小说《村歌》《铁木前传》，长篇小说《风云初记》。

1963年，孙犁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文章以气为主，当写时不能无锋芒，最好于心平气静时，多做几次修改，这样则义正而词有含蓄，最为妥当，亦‘经验’也。”他就是写一篇短文，也是全力以赴，写完后满脸涨红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像是母鸡刚下过蛋一样。他所写的作品，在没有发表和出版之前，总是反复修改，进行艺术锤炼。在写作的时候，就是一篇很短小的，几百字的文章，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下笔，精雕细琢，出奇制胜。在作品发表以后，不管是长是短，一般情况下他都能大体背诵出来。说明这些作品在写作的时候，他是看过多次、改过多次；就是在作品发表以后，他还要看若干次。就像是一个铁匠打制他的产品，要在铁砧上锤击砥砺。孙犁这种对艺术的严谨的、精益求精的态度，使他的作品具有着一种令人击节的乐曲的音韵和节奏，达到了一种可以叫做诗的优美境界。

因为工作关系，我读过孙犁的大量手稿。面对那些呕心沥血的文字，不能不对他写作的认真态度肃然起敬；也就知道，他那简洁、隽永、秀丽、含蓄的文字，是怎样写出来的。不要说一句话的增删，一个词语的改易，能够使得文章意味深长，形象鲜明；就是一个“的”字，一个“了”字，甚或是一个标点符号的调动，也能使得文章思想加深，节奏、音韵和谐。1963年春天，孙犁连续写了四篇散文——《回忆沙可夫同志》《清明随笔——忆邵子南同志》《黄鹂》《石子》。孙犁把稿子寄给我以后，接着又给我写了两封信，要对稿子做些修改。在一封信中，要对《回忆沙可夫同志》一文做两处改动，一、“最后得意忘形……跌了下来”删去；二、有一段有两处“戏剧大师”，都改为“戏剧家”。在另一封信中，附着两大段文字，一段补入《石子》，接补地点为“整个的采捕过程，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”之后；补入《清明随笔》的，接排在“他的为人表现得很单纯”那一段的后面。这真使我吃惊，稿子只一份，在我手里，孙犁竟能背着稿子进行修改，可见已经烂熟于心。1981年秋天，我手里有一篇孙犁为《张志民小说选》写的序言，当我去看望他，他让我把稿子寄给《小说林》，并且叮嘱把勾掉的一个字再画回来。稿子就在我的手提包里，便取了出来，要改动的一段文字，原稿是这样写的：“是的，志民和许多人，经历了这样的一段历史。他度过了艰苦贫寒的童年，然后进入了反抗残暴侵略的行列；他们学会了运用文字，这些文字，是伴随着枪声，射向敌人的；是伴随着犁耧，生产粮食的。”“他度过了艰苦贫寒的童年”一句，在“他”字的后面有一个“们”字被勾掉了，要画回来的，就是这个字。孙犁对他文稿中的每一个字，竟然熟悉到了这样一种程度。正如他在《文艺学习》一书中所写：“要熟悉你的语言，像熟悉你的军队，一旦用兵，你就知道谁可以担任什么角色，连战连捷。写作，实际就是检阅你的军队，把那些无用的、在战场上不活跃的分子，当场抹去他的名字，叫能行的来代替吧……选择语言，也如同农民选择好的种子，那样他才有希望使禾苗丰收。”

孙犁的写作，不仅有着文学理论的指向，而且有着文化修养的支撑。在抗日战争开始，正式走上文学道路之前，从1929年到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，他已有十年寒窗苦读，读了很多“五四”以后的新文学作品，刚刚翻译过来的苏俄文学作品和一些社会科学、文艺理论著作。他很喜欢普希金、梅里美、果戈理、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和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，喜欢他们作品里那股浪漫气息，诗一样的调子，和对于美的追求。他也喜欢契诃夫的短篇小说，写得单纯、朴素、简练、真挚。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是孙犁非常喜欢的一部书，其中对众多女性的描写，尤为欣赏赞叹。他最为喜欢的还是鲁迅，非常注意鲁迅的抒情的方法，叙述和白描的手法，特别是作品中的那种内在的精神，对人生态度的严肃，和对所写人物的命运的关注。这一时期孙犁的读书，称得上是真正的苦读、细读、熟读、精读，一些作品的章节段落，他是能够背诵下来的。在保定读中学时，下课后跑到读报栏前，站着阅读鲁迅发表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上的杂文，直到能背下来才肯离开。在北平流浪和在白洋淀边同口小学校教书时，把所读书中喜爱的段落抄录下来，贴在墙上，背过了就再换上一些别的。记得1962年秋天，在颐和园云松巢，我协助孙犁核阅《风云初记》，休息时谈起《红楼梦》，讲到晴雯这一人物，他竟然大段引用原文，背诵了晴雯补裘这一情节。他向我谈起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《死魂灵》，非常称赞，在这部书里，果戈理把自己对俄罗斯祖国的热烈希望，就是作为一个忠实儿子的情感，写进去了；并且向我背诵了那架旧式的马车，在俄国风雪的道路上奔驰，果戈理的赞叹之词。孙犁崇敬鲁迅，对鲁迅的著作，更是非常熟悉。有一次，我向他谈起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的一件事，他当即说出，在鲁迅某年某月的日记中有记载。他还对我说过，鲁迅的《朝花夕拾》，他是一生都放在案头的，尽管已经对这本书非常熟悉，一些段落和篇章都能背诵，但是还要经常翻看、阅读和体味。正是这样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师承，影响了孙犁的写作手法和语言的运用，以及风格的形成；加之他的生活经历、时代影响，尤其是情感经历、性格气质，造就了世人所称颂的一代名家孙犁。

孙犁与“荷花淀”

□刘宗武

一

“荷花淀”，一个多么美好的名称啊！从新中国成立后，迄今60余年，它已深深地印入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中，说“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”，似乎并非夸大其词。因为《荷花淀》作为语文教材一直收入教科书中，凡受过中等教育的人，无不在课堂上读过这篇作品，它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一个名称。

《荷花淀》是孙犁的成名作、代表作，也曾经作为文学流派的名称——荷花淀派，它发表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，1945年5月15日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上。它描写的是发生在河北（冀中）白洋淀地区，青年男女踊跃参加抗日斗争的小故事。

孙犁不是白洋淀地区的人，他的家乡在白洋淀之南100多里地的安平县孙遥城村——现在归衡水地区。抗战时期，他也没有在白洋淀地区打过游击。那么，他为什么能创作出反映白洋淀人民抗日生活的作品呢？这要从头说起。

1926年，孙犁从安国县高级小学毕业后，考入保定育德中学。育德中学不仅在保定市、河北省，而且在中国北方也是有名的中学，它的毕业生大都升入清华、北大、天津北洋等著名的高等学府深造。孙犁的学习成绩是很优秀的，中学阶段就在校刊上发表过小说、剧本，还在上海出版的刊物上发表过书评文章。1933年中学毕业，因为家境困难，家里无力支持他升入大学。他父亲主张他考邮政局，因为他父亲在安国县经商，与县邮政局的人有来往，认为邮政局的工作是铁饭碗，可以旱涝保收，衣食无虞。孙犁去考了，只是英语口语未通过而落选。此后，孙犁在北平市政府当过小公务员，在小学校当过事务员。那时，旧社会、旧官场的黑暗腐败，社会上的争权夺利、尔虞我诈，给他留下了极坏的印象。他心地纯正，志向高远，不堪龌龊的社会环境，没多久就不干了。不是他有多么厚实的家底，而是家中还有一碗粥喝。

回到家乡的孙犁，想以写作投稿为生，那时的稿酬，大致是一千字3-6元，一个月能发表五六千字，可有十几至20元的收入，也算不错的。他特意要求父亲订阅一份有名家主编副刊的《大公报》。可是，他的投稿没有被采用，一个月下来也没登出一篇。不是他没有写作才能，而是他缺乏动人的生动故事。他上学10多年，不是住在亲戚家，就是住在学校里，对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不很熟悉，在北平的两年，时间较短，除了上班，下班后回到租住的公寓，也是手不释卷地苦读新文学作品和各种书刊。即使剩下一点点工资，也买了刚出版的，鲁迅译、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《死魂灵》，如获至宝一样地阅读着，吮吸外国文学中有益的营养。但创作却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一时，孙犁还创作不出有社会意义的作品。

晚年，孙犁没有回忆说，在育德上学时与白洋淀发生过什么关系，也没有说过有过密切交往的白洋淀的同学，但是当年，他正找不到适合自己志趣的工作，又实现不了当作家的愿望，在倍感茫然之时，两个育德的老同学给他来信，介绍他到白洋淀边（今天的安新县同口镇）同口完全小学教书。孙犁很愉快地应聘了，1936年暑假后，他到同口小学担任五六年级的国文课，常常从书上选取有关时事的文章教给学生，课外还编剧本演出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。他的月薪是35元，除生活费用，还可以从上海邮购图书。夜晚，独居学校的小楼上，备课、读书，抄录自己喜欢的名言佳句背诵。闲暇之时，深入到白洋淀周边的村落，了解民俗民情，观赏淀上的自然风光，结交了几位当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……可惜的是，好景不长，他到同口的第二年，即1937年7月7日，发生了卢沟桥事变，日本帝国主义妄想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，开始了侵略战争，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地展开了。

这年冬季的后半期，冀中平原是动荡不安的。秋季，滹沱河发了一场洪水，接着传来日本兵已打到保定的消息。滹沱河距孙犁家乡的村庄才几里地，那时交通工具简陋，洪水泛滥人们是不能出行的。所以，暑假后他没有返回同口，学校也没有开学。于是，他就主动地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，经常往返于他的村庄和安平县之间。由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就驻在县城里，他的几个过去的同事，在其政治部工作。抗日人人有责，当时他虽然还没穿上军衣，也分配到一些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。主要有，编写一本《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》的小册子，由自卫军政治部油印发行；在《红星》杂志上，发表论文《现实主义文学论》，第一次用了笔名孙犁，在《冀中导报》上发表论文《鲁迅论》（已佚），等等。1938年春天，他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。

二

1939年春天，孙犁被介绍到冀西阜平，分配在刚刚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，做通讯指导工作。之后，又在《晋察冀日报》、文联、华北联大高中部等单位，或做编辑、或教学，同时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。他说，“在这一地区，随着征战的路，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”（《在阜平》）。他初始创作的是小叙事诗，第二篇就取名《白洋淀之曲》。这是他围绕着白洋淀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生活而创作的诗歌、小说、散文中的第一篇。在这一篇里，即出现了“荷花淀”这个淀名，和名字叫水生的游击队员。水生的妻子叫菱姑，他们从小就认识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水生英勇战斗，壮烈牺牲，菱姑拿起水生的枪，手不颤心不跳，“一股热血冲上她的脸/热情烧蓝她的瞳孔/水生的力量变成了她的力量/扳动枪机就握住了活的水生”。在孙犁笔下诞生的，白洋淀地区抗日战争的第一个青年形象，就是一个光辉的英雄人物，他表现了英勇战斗、誓死打击侵略者，保卫自己家乡的意志和决心。

随后，孙犁创作了小说《琴和箫》，描写抗日烈士遗留下的两个女儿，在白洋淀边长大成人的故事。

1944年秋，孙犁到延安，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先后当研究生、教员。

这时，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七八年了，他离开家乡、父母、妻子和子女也很久了，他很想念家乡、想念他们。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，但还难以预料哪年哪月才能返回故乡，思乡思亲的情绪深深地缠绕着他。这时，从冀中平原来了一位战友，曾对他讲了两个战斗故事，于是强烈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，很快就写出两篇作品，其一即小说《荷花淀》。

《荷花淀》的内容，读者无不耳熟能详。这里，主要谈两个问题：

一、荷花淀的淀名完全是作家虚构的。白洋淀大大小小有数十个淀名，没有一个叫荷花淀的。荷花，又名莲，古时叫大渠（芙蕖）、菡萏。保定有莲池，北京有莲花池，古代有散文名篇《爱莲说》。白洋淀里有一个淀叫莲花淀，也不是孙犁所描写的，他的“荷花淀”可以说泛指整个白洋淀，今日白洋淀里有许多自称荷花淀的，不能说就是孙犁所描写的“荷花淀”。

二、抗日战争8年，孙犁一天也没有在白洋淀生活过、战斗过，他完全在自己的家乡和冀西，以至延安等地工作、创作，为什么他能写出反映白洋淀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的作品呢？

孙犁的《荷花淀》创作，正是一次最高的艺术想象的活动。首先，他对自己的家乡、人民、广大农民的思想感情是非常熟悉的。他和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息息相通、水乳交融的。他深知：“农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强烈的。他们面对的现实是：强敌压境，自己的生命，自己的家园，自己的妻子儿女，都没有了保障。他们要求保家卫国，他们要求武装抗日。”“在抗日的旗帜下，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，面对的是最残暴的敌人，不抵抗政策，早已被人唾弃，他们知道：凡是敌人，如果你对他抱有幻想，不去抵抗，其后果，都是不堪设想，无法补偿的。”“这是全民战争，那时的口号是：有人出人，有枪出枪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”北方农民的这种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和决心，是创作《荷花淀》的坚实基础，是《荷花淀》取得成功、获得生命力的保证和关键的条件。

抗战8年的日子里，孙犁虽然没有直接上前线，与敌人面对面地战斗，但是在通讯社、报社，时时刻刻从前线传回大量的战斗故事。大至百团大战、平型关大捷，小至敌人的“扫荡”，小股敌兵下乡骚扰，无数的战斗信息传至他的脑际，种种战斗情景，他太熟悉了。而他3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，在白洋淀地区虽然仅仅生活了一年，但那里的自然条件、风光景色和民俗民情，给他的印象太生动、太深刻了，刻骨铭心，终生不忘。把北方人民誓死抗战的决心和行动，灌注到白洋淀边青年男女的身心之中，从而反映了北方广大人民的愿望意志和行动，是再自然、再恰切不过的了。所以，孙犁无比自信地说：“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，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，所有送走自己儿子、丈夫的人们的感情。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，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，就会受到感动。”（以上引文，均见《关于〈荷花淀〉的写作》）当时如此，今天依然，将来同样是，这正是优秀作品传世、不朽的缘故。

高尔基也说，“想象是创造形象的文学技巧的最重要手法之一”。“有才能的文学家正是依靠这种十分发达的想象力，才能常常取得这样的效果：他所描写的人物在读者面前要比创造他们作者本人出色和鲜明得多，心理上也和谐和完善得多。”（《论文学技巧》）

6月2日，散文《白洋淀边一次小计争》发表于重庆《新华日报》，在大后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三

1945年8月14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完全胜利了。8月底，孙犁又创作了《芦花荡——白洋淀纪事之二》，发表于延安《解放日报》。

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”的日子到了。

这年孙犁32岁，正当年富力强。10月，随华北文艺大队先到达张家口，洗澡换衣，焕然一新，经领导批准，他独自步行返回冀中，在家里住了不过4天，即到蠡县深入生活，从事写作。1946年在河间县，他又写了《荷花淀》的续篇《嘱咐》，描写水生从部队请假回家，待了不到半夜的工夫，鸡叫三遍，即让妻子撑着冰床子，送他返回部队，好早早打败敌人，回家团圆。

1947年，过了整整10年，孙犁才重返白洋淀，住在同口镇老战友陈乔的家里，又到采蒲台、端村、安州等地采访。前后写出了散文《渔民的生活》《织席记》《采蒲台的苇》《安新看卖席记》《一别十年同口镇》和小说《新安游记》《采蒲台》等。大都发表于当地的刊物《冀中导报》上。

但是，孙犁的这次白洋淀之行不够愉快，不是他的感情不深，而是为虚名所累。《荷花淀》发表后，他即蜚声文坛，成了名人，他到河间时，《冀中导报》为他登了有麻将牌大小的一则简讯，称之为“著名作家”，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；后来召开了土地会议，因为家庭成分他又被“搬石头”，遭到隔离。冬天，《冀中导报》以整版的篇幅对他进行批判。所谓的问题是：《一别十年同口镇》写“土改”后富农家庭的成员参加劳动，自食其力了，被指责为“立场”问题；《织席记》的描述是“丑化农民”；《新安游记》仅仅是将实际生活中的城南头写为东北头（方位不准），被指责为“客里空”（即虚假之意）。问题弄得这么严重，“左”得邪乎，主要的是与家庭成分有关——被定为富农。这给了孙犁非常大的打击，是从未想到的，这个沉痛的教训，到了晚年他还是念念不忘的。他较早地领教了极左的残酷，不过给他在进城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而没有失足落水，打了长效的免疫针。

在“文革”的1972年时，孙犁被迫去到白洋淀体验生活，曾住过王家寨，郭里口等处，为了创作“样板戏”，访问过抗日战争时的女游击英雄。在那种情势下，不得不金蝉脱壳，他创作了京剧脚本《莲花淀》交差，晚年又写了《戏的梦》，回忆这段生活。

此后，一直到去世，他再没有去白洋淀，也没再写有关白洋淀的作品。2003年，孙犁逝世一周年时，白洋淀的荷花大观园内，建立了孙犁纪念馆，立了孙犁的塑像，供广大读者观瞻、凭吊。

四

孙犁在白洋淀仅仅生活了一年，这里却成了他一生的文学事业的起点。他不仅创作出不朽的名篇《荷花淀》，而且还创立了一个荷花淀派。上世纪50年代，有一些文学青年学习他、追随他走上文学之路，70年代、80年代，又有一些文学青年受到他的影响和指导开始了文学创作。前者有刘绍棠、从维熙、韩映山；后者有铁凝、贾平凹、贾大山等等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至于说喜爱孙犁作品的读者，或老或少，几乎随时随地都可遇到。综上，这是新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一种现象，值得我们认真、深入地研究探讨。

孙犁是在抗战8年间，完全从解放区土生土长起来的作家。姑且不论“文革”后他的《耕堂劫后十种》，仅以他在解放区发表的文学作品来说，应给予怎样的评价呢？

在《〈孙犁文集〉自序》中他说：“我的创作，从抗日战争开始，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，神圣战争，所作的真实记录。”“现在证明，不管经过多少风雨，多少关山，这些作品，以原有的姿容，以完整的队列，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的严峻检阅。”在《〈张志民小说选〉序》中，他更满怀信心，自豪地说：“他们的战斗、牺牲，是没有个人的要求的，是没有个人的计较的。你说是受苦受难也好，你说是一片空白也好，中国的历史，总会记得有这样一批战士，我们的地图，标志着他们荷枪实弹战斗过的许多地方。”“……这些作品，记录了时代，记录了张志民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，战斗和劳动的经历。其中没有虚妄，因此也就没有狂诞。这些作品，是朴实的，含有作家的激情和理想。作家对人民是忠诚的，是谦虚的……因此，可以断言，这些作品将被历史所容受、记录，也会被今天的生活所承认、证实。”

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，两三千年来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各民族之间你争我夺、战火纷繁、连绵不断。不论是汉族，不论蒙古族、满族统治了九州大地，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事；而英法联军、八国联军、甲午海战……都是异族侵略者的入侵，日本帝国主义可谓登峰造极，妄想灭亡中国，所以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、艰难竭蹶、血流成河的大灾难。今天，我们不可讳言，抗战是全国上下四万万人民同仇敌忾的全民抗战；同时，也绝对不容忽略的是，当国民政府军，被日本军队从北方打到南方，大城市接连地失守，南京陷落、首都西迁陪都重庆，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被日本军占领了。在敌后的广大国土上，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民，打击、袭扰日本军队，同样也牵制日本的兵力，消灭了他们的有生力量，加速他们走向失败和灭亡。所以，这是全面抗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。而你要了解广大解放区人民的抗日决心和斗争，你要知道8年抗战的日子里，那里千千万万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、战斗的，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变化，你就要读读解放区的文学作品，要读孙犁、赵树理、徐光耀、杨朔、刘知侠、田间、阮章竞等等，他们的小说、诗和散文。这一大批作品的历史意义和认识价值，随着历史的前进会愈加深刻和伟大，它们都是绝不容轻视和忽略的文学珍品！

（上接第5版）我离开时，保姆杨玉珍阿姨已经回来了，我让阿姨多让他开心点，阿姨说：“不，大叔昨晚就为万国儒去世不高兴喽。”

现在，孙犁这两篇文章都在，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读读。20年过去了，文章读起来仍然是那么让人心动，如同我们走在青山夹峙的峡谷里，白云与林涛相伴，飞鸟与瀑布齐鸣，虽感动而不忧伤，流泪而不伤神，痛苦却充满再生的阳光——因为孙犁是在用真挚感情写它们，在用生命抒发它们——文学，文学，说到底是人学，是人的思想之学，没有对人的感情，文学就不能传之久远。

对认识的朋友如此，对素未谋面的朋友，孙犁一样是尽力周详照顾，不让人家感到失望。1994年4月11日下午，我收到孙犁一封比较厚的信，未拆开之前，我以为孙犁给我写了很长的信，拆开后才明白怎么一回事。原来，武汉作家周翼南给老人写信求教，并寄赠一幅画，孙犁找不到周的地址，就把给周的回信和写的一幅字，寄到我这里来——那时候我已从天津到北京工作——让我转给周翼南。那时，我也不知周翼南的地址，我就打电话给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洪烛询问。洪烛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，在武汉有一些人脉，果然告诉我周翼南在武汉作家协会工作。我立即把给周翼南的信和字复制一份后，复制件寄回老人，原件挂号寄给周翼南，并在信中告诉他孙犁的详细地址，使他们之间建立了联系。过了两天，我给孙犁打电话，老人还特意过问此事。

这当然不是个例。孙犁去世后，我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校《孙犁全集》时，有机会又把孙犁的作品全读了一遍，无意中发现，孙犁给一些人的书信，或联系的一些人，我都做过中间人。前些时搬家，又发现几封孙犁给我的从未曾发表过的信，里面也提到让我帮助别人的事情。

这些事当然不是什么大事，高人都会忽略不计。可孙犁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做过来，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无法代替的地位，他笔下的人物，也为中国文学艺术的画廊增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形象。他的半个多世纪文学的创作，是在创造着文学史，而非重复着文学史——孙犁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内涵。判断一个作家是否是大师，就看他有没有创造性，是否可以重复——孙犁创造的一切文学特质都不能再复制，所以他具备真正的文学大师的资质。

孙犁所做的这些事，也如散射的霞光，细碎却不凌乱，闪耀着灵魂的光芒。作家是需要灵魂的，作家写作是需要灵魂的，只可惜现在有灵魂和用灵魂写作的作家太少了。闪耀着灵魂光芒的孙犁距离我们越来越远，不知道这是作家的悲哀、社会的悲哀，抑或时代的悲哀。我凌晨3：30起床来，一边查找日记本中和孙犁相见的记录，一边写这篇文章，想起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很久，我的眼里溢满了泪水。